

## 從《蠅王》的譯本看譯者對 小說中「困惑成分」的處理手法

張佩瑤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

翻譯文學作品，常會碰到使人困惑的字、詞、意象、隱喻、寫作手法等等。即使是小說這類似乎最容易理解的文學作品，也往往會有很多使讀者困惑的成分。其中又以二十世紀西方現代派小說為甚；因為這些小說家都很少寫說教味濃或是道理明晰的作品。對人、對事、對物、對世界，他們都採取一種比較複雜、多層面、多角度的看法。他們的作品籠罩着強烈的探索精神，更強調探索時遇到的那種好像看不清、摸不透、測不準、充滿矛盾的經歷。這種經歷，又往往蘊含了作品的精髓。因此，要翻譯這些能產生及包容多種對立或相反意義的作品，我們必須考慮一個問題——如何處理作品中使讀者困惑的成分。現試舉一例，看看譯者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國二十世紀小說家威廉·戈爾丁(William Golding)的名著《蠅王》(*Lord of the Flies*)裏面有下面一段描述，這段文字是形容其中一個小孩——西門——被其他小孩殺害的經過：

The circle became a horseshoe. *A thing* was crawling out of the forest. It came darkly, uncertainly. The shrill screaming that rose before *the beast* was like a pain. *The beast* stumbled into the horseshoe.

“Kill the beast! Cut his throat! Spill his blood!”

The blue-white scar was constant, the noise unendurable. Simon was crying out something about a dead man on a hill.

“Kill the beast! Cut his throat! Spill his blood! Do him in!”

The sticks fell and the mouth of the new circle crunched and screamed. *The beast* was on its knees in the centre, its arms folded over its face. It was crying out against the abominable noise something about a body on the hill. *The beast* struggled forward, broke the ring and fell over the steep edge of the rock to the sand by the water. At once the crowd surged after it, poured down the rock, leapt on to *the beast*, screamed, struck, bit,

tore....<sup>1</sup>

我們第一次閱讀這段文字時，一定會感到十分困惑，不清楚 the beast / it 和 Simon 的關係。我們不能肯定西門究竟是不是 the beast，也不能肯定小孩究竟是把西門看成是 the beast 還是把他誤當為 the beast。讀者這種困惑感完全是因戈爾丁的文字運用而產生的。現在讓我們看看《蠅王》的幾位譯者如何處理 beast、it 和 Simon 這幾個使讀者困惑的字。（由於篇幅關係，我只引用五位譯者對引文第一段的翻譯）：

圓圈變成馬蹄形。叢林裏爬出個東西——西門，他陰沉而猶豫地過來了。在他面前響起的尖厲的叫聲好像在喊痛，他一頭栽進了馬蹄圈。<sup>2</sup>（陳瑞蘭）

有一個東西從森林裏爬出來。吃不準爬出來的是個甚麼東西，黑咕隆咚的。在「野獸」面前孩子們發出受傷的尖利急叫。「野獸」磕磕絆絆地爬進馬蹄形的圓圈。<sup>3</sup>（龔志成）

包圍圈變成一個馬蹄形。有個東西爬出叢林，在電光閃影中躊躇地向這邊走過來。在一片淒厲的尖叫聲中，怪獸撞進了馬蹄圈。<sup>4</sup>（黃錫祥）

圓圈變成馬蹄形。有個身影由森林爬出來，形象暗暗的，很模糊。大家像劇痛般在怪物面前響起一陣尖叫。怪物跌進馬蹄圈。<sup>5</sup>（宋碧雲）

圈子變成馬蹄形。有個東西從樹林中爬出來。牠黑黑的搖晃不定。在這猛獸前，孩子們恐懼的叫聲尖銳得如同慘痛的號叫。那猛獸顛簸着進入馬蹄形內。<sup>6</sup>（楊耐冬）

從這五位譯者的譯法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三種非常不同的處理方法。陳瑞蘭是用了化困惑為清晰的手法。她可能在第一次閱讀這段文字時，感覺到當時的情況很混亂，於是在翻譯時便化繁為簡，使讀者清楚知道從叢林爬出來的是西門。龔志成則可

1 引自威廉·戈爾丁(William Golding)《蠅王》(Lord of the Flies)，英國費博出版社，1969年英文版平裝本，頁168。

2 引自陳瑞蘭(譯)《蠅王》，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年，頁170。

3 引自龔志成(譯)《蠅王》，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頁180。

4 引自黃錫祥(譯)《蠅王》，載《翻譯文學選刊》，1984年創刊號，頁62。原載《世界文藝》1982年第4期。

5 引自黃碧雲(譯)《蒼蠅王》，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頁200。

6 引自楊耐冬(譯)《蒼蠅王》，台北：志文出版社，1985年，頁240。

能意識到這是作者刻意的手法，所以把 *beast* 直譯為野獸，但又怕讀者感到困惑，便把「野獸」一詞全都加上引號，使讀者知道所謂「野獸」其實並不是真的。其他三位譯者，則保留了原文使人困惑的成分。

這三種處理手法都沒有錯譯的問題，但讀來截然不同。原文的第一段，由於戈爾丁用的是 *a thing* 而不是 *a child*、*It* 而不是 *He*、*the beast* 而不是 *Simon*，我們初讀這段文字時，一定會以為真的有頭猛獸突然從叢林裏爬出來。這就是說：戈爾丁透過文字，使我們跟小孩同樣感到一種突如其來的恐懼，感到霎時間情況很混亂。我們應記得，這事發生的地點是叢林外面毫無遮蔽的海灘，時間是深夜。當時正下着滂沱大雨，雷電交加。孩子因為怕黑，以為叢林裏真的有頭猛獸，才怕得跳起戰舞，高呼口號，互相壯膽。正因為戈爾丁能把孩子的心理狀態刻劃得淋漓盡致；正因為他能使我們感到孩子的恐懼和情況的混亂，所以，縱使我們發現所謂猛獸原來就是西門 (*Simon was crying out something about a dead man on a hill* 和 *It was crying out... something about a body on the hill* 這兩個句子使我們猜到猛獸就是西門)，我們仍然能夠明白孩子為甚麼會把西門誤當為猛獸。又因為戈爾丁使我們能同時從局內人 (即孩子) 和局外人的角度看這件事，所以，讀到西門被追殺的那段文字時，我們的反應不免變得極為複雜。*The beast* 這個名詞不斷的出現，使我們深深感受到孩子心理上的恐懼是多麼強烈地控制着他們，驅使他們去殺死這頭對生命安全構成威脅的猛獸。但同時我們也知道這種恐懼是多餘的，西門其實是唯一能夠替孩子消解恐懼的人，因為他已發現大家所害怕的那頭猛獸，原來就是山頂上的一具死屍。因此，我們讀到孩子追擊西門的那一段文字時，便不能不為西門的安危擔心，更不能不感到孩子的行為是多麼兇殘暴戾。

但是，如果我們閱讀陳瑞蘭的譯本，便不能得到這種複雜的閱讀體驗，因為陳譯使我們清楚知道從叢林爬出來的是西門。正因為如此，陳譯的讀者對這本小說的意義，一定會有很不同的看法；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孩子是如何因恐懼而把西門誤當猛獸，繼而把他殺死。他們必定會認為孩子是獸性大發，才会有這種殘暴的行為。這種看法是可以成立的；但閱讀原文的體驗告訴我們，戈爾丁不是說人性全是惡的，而是說「惡」是人性的一面。對付「惡」的方法，不是把罪惡的行為歸咎別人或外在的因素 (例如西門、或猛獸的襲擊、或心理上的恐懼)，而是承認和面對「惡」是源自內心的事實 (在第八章西門和蠅王的對話中，戈爾丁已把這要旨清楚帶出來)。但他同時也使我們明白和了解到在某種情況下，人對自己的行為，實在不能自主、難以自持。戈爾丁偉大的地方，正在於他能使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深深體會到做人的難處，以致見到人被自己的弱點、獸性、惡行所控制時，雖不會苟同，卻同時會產生惻隱之心。我們從而體會到人之所以為人，正因人有善惡兩面；而人之所以值得憐憫同情，則因其善的一面常因某種原因而被蒙蔽或淹沒。

龔志成的譯本也不能把原文賦予讀者那種複雜的閱讀體驗再創造出來。龔譯的讀者一開始便會因為引號的提示，知道「猛獸」不是真的，因此即使清楚知道孩子把西門誤以為是「猛獸」，也絕對不會感受到孩子的恐懼，更不會同情孩子的殘暴行爲。

黃錫祥的譯本較能重視原文的效果。可惜的是他把原文的 It 和第一個 the beast 略去。在閱讀的過程中，這個 It 和 the beast 其實都有重要的作用。當 a thing 在引文的第一段出現時 (A thing was crawling out of the forest)，我們不知道 a thing 究竟是甚麼，所以感到困惑。然後，忽然間，這「東西」變成了 It。這個 It，加上動詞 crawling，使我們猜想 It 和 a thing 是指一隻動物。然後，這隻動物便成了「那隻野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霎時間，我們也糊塗了。戈爾丁正是通過這種巧妙的文字運用，使我們也和孩子一樣，感到不知所措，所以譯者最好還是把這種好像看不清、摸不透、測不準的閱讀體驗再創造出來。

宋碧雲的譯文本來不錯，大致保存了原文那種詭秘緊湊的氣氛。但她卻把 the beast 譯成「怪物」，而在這書的前幾章——例如第五章 *Beast from Water* 和第六章 *Beast from Air*——她卻把 beast 譯為「怪獸」。因此，譯文讀者可能不知道這段文章的 the beast 其實就是孩子在前幾章極為害怕的 the beast，而單單以為孩子因為西門突然從黑暗中「爬出來」，便把他當作不知名的怪物，然後把他殺死。無論如何，譯文讀者必定不能像原文讀者一樣，從這段文字所指的 the beast 聯想到孩子在前幾章常常談到的 the beast。譯文讀者可能會懷疑這隻怪物其實就是那頭怪獸；但譯者應否在這段文字放棄「怪獸」一詞而改用「怪物」來譯 the beast 這兩個把整部小說的要旨貫通起來的字呢？她是否不必要地增加了這段文字、甚至是整個作品的困惑成分呢？

上面四個譯本遺漏了的原文文本意義，楊耐冬的譯本都保存下來，所以我認為是最令人滿意的翻譯。

這篇文章所探討的例子，讓我們明白譯者有必要小心處理文學作品中令人困惑的成分。譯者既要避免把譯文變得太簡單明晰，又要避免把譯文變得比原文更複雜而增加讀者詮釋的困難。能夠避免這兩種偏差，才能在譯文中把作品的困惑成分保存下來。當然，我們必須就原著令人困惑的地方加以仔細分析，弄清這究竟是作者刻意營造的效果，還是因為自己理解力不足而出現的盲點。如果分析的結果顯示作者是有意通過文字的運用而把讀者帶進一個撲朔迷離、霧裏看花的境界，那麼我認為譯者是有責任盡量把這境界再創造出來的。翻譯二十世紀英美現代派的小說時，有必要特別留意這個問題。